

编者按

八百年齐风浩荡，三千年文脉绵长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齐文化以“因其俗、简其礼”的包容胸襟、“尊贤尚功”的进取风范、“仓廩实而知礼节”的务实智慧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绚丽篇章。

本报推出《寻齐记》系列报道，循着历史脉络，探访齐文化的物质遗迹、思想精华，以及在当代社会治理、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，从中品齐风古韵、映时代华光。

寻齐记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9月中旬，第二十二届齐文化节开幕式上，有两个节目特别火。一个是《泲泲齐风》，用音乐、舞蹈、视觉艺术，表现了齐文化的大气磅礴；另一个是情景剧《太公封齐》，演员们穿着古代的衣服，演绎了姜太公受封、打莱人、治齐国的故事。

太公封齐，是齐国历史的起点，也是齐文化的基石。周天子分封诸侯，姜太公得到了“煲手的山芋”。在东方大地，他创造了一段奇迹，并影响了世界三千多年。

被逼打了场硬仗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里写了句话：“天下三分，其二归周者，太公之谋计居多。”意思是，起初周人能拿到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，靠的主要是姜太公的谋划。

公元前1046年，牧野之战。周武王带着西岐军队，加上诸侯联军，满打满算就几万人；而商纣王这边，一下子凑了70万大军。在决胜局，又是姜太公亲率六师精锐，指挥击败了敌军，实现改朝换代。

灭商之后，周天子要分封，姜太公排第一，没人有意见。但封去哪儿，是个大学问。分封不是论功行赏那么简单，更像是“派你去看国门”。周天子把亲戚、功臣分封到各地，本质是让他们当“藩王”，替王室挡住周边的敌人。而东边的东夷，就是当时最凶的敌对势力。

姜太公的封地营丘到底在哪儿，学界至今没有定论，但基本是在淄河流域。这个地方看着不大，却是整个东部地区的咽喉：南边是泰山，西边是济水，东边是山东半岛，北边是大海。只要占了这里，东夷人就没法往西闯，周天子的东部边疆才算真正稳固。

东夷是一大片区域的统称，以泰沂山脉为中心，包括现在的山东全境、河南东部、江苏北部、安徽北部，甚至辽东半岛。东夷人在海边长大，性子豪爽，特别能战斗。“齐”这个字，在甲骨文里像三个箭头，因为东夷人善射，是出了名的“弓箭手民族”。

商纣王其实是栽在东夷人手里的。甲骨文记载，商朝跟东夷的战争没断过，纣王在位时，更是倾全国之力打东夷，虽然赢了，却把国力耗空了。《左传》里的“纣克东夷而殒其身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纣王不是被周武王打败的，而是被东夷拖垮的。

周天子里门儿清：东夷这地方，要是派个软弱的去，不出三年就得被挤走；派个没本事的，只会重蹈纣王的覆辙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姜太公合适。

姜太公一开始没意识到事情的紧迫性。从镐京到营丘，路程不算近，他带着军队走得慢悠悠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老人凑过来问了句：“大人是去东边建封国的吧？我看别的诸侯都急着赶路，您怎么走这么慢？”

这句话像一盆冷水，浇醒了姜太公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：东夷这地方卧虎藏龙，夜长梦多。当天晚上，他就下令：全军日夜兼程，必须在天亮前赶到营丘。

果然，等姜太公的军队赶到营丘，东边的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一支大军：是东夷的莱人来抢地盘了。莱国临海，虽然国家不大，但战斗力极强，这次想趁着姜太公立足未稳，把“外来户”赶回去。

姜太公刚到封地，连城墙都没来得及加固，就被逼打了一场硬仗。好在他经验丰富，打了三天三夜，成功逼退了莱人。但这场仗让姜太公彻底明白，东夷人不是好惹的。想在这片土地上站住脚，蛮干不行，他必须换个思路。

“地狱开局”成功逆袭

打赢了莱国，姜太公站稳了脚跟，但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。齐国的地盘，说是方圆五百里，但大部分土地都是盐碱地。史书称“地潟卤，人民寡”，这种土地没法种庄稼，老百姓也少得可怜。在那个靠农业吃饭的年代，齐国简直是“地狱开局”。

更麻烦的是身边的邻居。东夷人不认可周朝统治，也不觉得齐国该是“老大”，要是强行推行周朝制度，说不定会引发更大的叛乱。

要治东夷，得先懂东夷。姜太公没急着下命令，而是先做好调查研究，派人去了解东夷人的风俗、文化。这一了解才发现，东夷人不仅能打，文化还特别发达。

东夷人身高比中原人高不少，考古发现，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时期的东夷人，平均身高比中原人高4到5厘米，“山东大汉”名不虚传。他们还特别善射，射箭是他们的礼仪。东夷人祭祀、结盟甚至结婚，都要射箭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技能。今人熟悉的“后羿射日”神话，其实就是东夷人善射的写照，后羿的原型正是东夷部落的一位首领。

更棘手的是，这群人很聪明。东夷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，考古证明，4000多年前，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龙山文化。他们会做黑陶，最有名的“蛋壳黑陶杯”，薄得像蛋壳，还能透光；他们会建城，龙山文化的古城遗址里，有城墙、护城河，甚至还有排水系统；更重要的是，东夷人可能早就有了文字的雏形，龙山文化陶器上，有不少符号跟后来的甲骨文相似。

姜太公意识到，东夷人有自己的文化骄傲，不是红口白牙说自己“正统”就能征服的。要是强行把周朝的理念灌输给他们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几经思索后，姜太公在齐国打出一套三连击的“组合拳”。

第一招是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，不搞专制霸权。

周礼是周朝的国家制度。从天子到诸侯，再到老百姓，穿什么衣服、吃什么饭、见了面行什么礼，都有严格规定，核心是等级秩序。

周天子本来指望姜太公把周礼带到东夷，让东夷人“归顺”，但姜太公知道，东夷人没那么容易臣服。于是，他作了个大胆的决定：放弃全面推行周礼，搞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。东夷人的风俗，只要不违背大的原则，就顺着他们来；至于礼法，能简化的就简化，不搞“一刀切”。

这六个字确实适合当地实际。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里说，东夷人有“仁”的风俗，也就是说东夷人重情义、不蛮横。姜太公的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，其实是尊重了东夷人的文化独立性，求同存异，放弃了“专制霸权”。这一招特别管用，没过多久，周边的东夷部落就主动来归附齐国了。他们觉得姜太公不是来“征服”他们的，是来和他们一起过日子、交朋友的。

第二招是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，找到经济引擎。

解决了“人和”的问题，还得解决“吃饭”的问题。齐国的土地贫瘠，种不了庄稼，怎么办？姜太公把目光投向大海。

海边有一样宝贝，是所有人都离不开的，就是盐。那时的盐，不是现在超市里随便买的调味品，而是“硬通货”。没有盐，人会没力气，军队没法打仗，老百姓没法下地干活。中原地区普遍缺盐，而东夷地区虽然靠海产盐，但原先都是零散的小作坊生产，产量低，质量也差。

姜太公看到了机会。他把零散的盐户集中起来，形成规模化生产，食盐产量大幅增加。在此基础上，太公与东夷诸侯、中原诸侯国开展食盐贸易，使得齐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。

这一招太狠了。周边的东夷诸侯，要靠齐国的盐过日子；中原诸侯国，也得靠齐国的盐维持民生。齐国一下子从“穷光蛋”变成了“暴发户”。盐卖出去换回来的粮食等物资，既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，又能用来武装军队。正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说，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，而人民多归齐”，没过多久，齐国就从一个“地狱开局”的小国，变成了人心归附、经济富裕的大国。

第三招，拿到征伐之权，名正言顺地开疆拓土。

有了人，有了钱，接下来就是“扩地盘”。齐国一开始只有五百里疆域，在东夷地区只能算个“小个子”，周边的莱国、纪国、莒国，个个都不是善茬。姜太公想着扩地盘，但没理由。周天子没授权，随便打别人，会被说成“叛乱”。

机会很快来了。公元前1043年，周武王去世，继位的周成王年幼，没法理政。周武王的弟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，觉得自己有资格掌权，就勾结起来发动了叛乱，史称“三监之乱”。

这时的周朝，刚建立没多久，人心不稳，摇摇欲坠。姜太公作为周武王的“尚父”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，马上带兵全力平叛。

叛乱平定后，为了感谢他，也为了让他继续“镇住”东夷，周王室给了姜太公一个特权：“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。”意思是，从海边到黄河，从穆陵到无棣，只要这范围内的诸侯或部落敢叛乱，齐国国君不用请示周天子，直接就能带兵去打。

有了这把“尚方宝剑”，姜太公扩地盘就名正言顺了。哪个东夷国家不服，就说它有叛乱之心，直接打服；哪个小诸侯不听话，就说其违逆周天子，照样收拾。具体效果按《史记》的说法是：“齐由此得征伐，为大国。”

这一特权甚至延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。鼎盛时，齐国已经是“地方二千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”的规模，天下无人敢小觑。

太公文化影响了三千多年

姜太公活了多少岁，史书没明确记载。这个老七旬出道，一辈子都在“搞事业”的古人，给中国留下了太多遗产。其中，不仅是一个强大的齐国，还有绵延不绝的齐文化。

姜太公去世后，周天子特意下令，把他的灵柩运回镐京，葬在周文王、周武王的陵墓旁边。这是极高的荣誉，只有对周王室有“再造之功”的人，才能享受。更特别的是，前五代齐国国君，都按照“返周而葬”的规矩，埋在镐京附近。这说明周王室一直把齐国当成“自己人”，把姜太公当成了“定海神针”。

到了唐朝，姜太公的地位又升一级。公元760年，唐肃宗把姜太公尊为“武成王”，跟“文宣王”孔子并列，还在全国建了“武成王庙”，用以祭祀姜太公和历代名将。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“武圣人”，关羽的“武圣人”地位，其实是宋朝后才获得的。

为什么姜太公能有这么高的地位？因为他不仅会打仗，还懂治国、谋略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思想里有“人本”的观念：把人放在第一位，尊重人的需求，求真务实。

这种思想影响了后来的齐文化，甚至影响了孔子。孔子虽是鲁国人，但鲁国和齐国相邻，孔子年轻时曾到齐国游学，很容易受到齐风的影响。孔子提出的“仁”，跟东夷人重情义的风俗，还有姜太公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的政策，其实是有传承关系的。

姜太公的影响力，甚至遍及全球。他本姓“姜”，因为祖上曾被封在“吕”地，所以也叫“吕尚”。他的子孙里，有的以“姜”为姓，有的以“吕”为姓，还有的因为封地、封官等，改成了其他姓，比如“崔”“丘（邱）”“高”“许”“谢”等。据统计，全世界有100多个姓氏，都能追溯到姜太公那里。

现在的姜太公，早已IP化。特别是在临淄，随处能看到“太公元素”，而且十分接地气。

先说地名。临淄有个太公湖，是国家水利风景区，跟“东方金字塔”田齐齐陵隔湖相望，4300亩的生态湿地，白天看是绿水青山，晚上灯光照在湖面上更是流光溢彩。还有太公植物园，里面有一座18.6米高的姜太公雕像，他手里拿着钓竿，眼睛炯炯有神，旁边有座9.9米高的“太公宝鼎”，据说是参照齐国礼器而造，不少游客都来拍照打卡。

再说说活动。每年9月12日，是姜太公的公历诞辰日，临淄会举办“祭姜大典”。2025年的“祭姜大典”，来了1700多位海内外的姜太公后裔。他们穿着传统汉服，按照古代礼仪，向姜太公雕像敬献花篮、宣读祭文，场面隆重。除了祭典，同一天还搞了“非遗市集”。在现场，有做南仇捶击丸子的，有做绣流苏蹴鞠的，还有做龙缸酱油的。游客既能看热闹，又能吃美食、买手工艺品，庄严、热闹两不误，包容开放的太公文化变得具象化。

太公文化还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。在淄博的小炉匠琉璃工作室，艺术家们做了一组《太公封齐》的灯工琉璃作品。它长3米，宽0.6米，分了五个场景：“封齐”“因俗简礼”“劝女工，极技巧”“便鱼盐之利”“武王访齐，尊贤拜功”。场景里的人物、战车、盐场，做得特别精细，连姜太公的胡须、士兵的铠甲都清晰可见。这组作品在2024年的淄博陶琉会上大放异彩，吸引了众多目光。

姜太公封齐的故事，已经过去三千多年了，但现在读起来，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。他不是靠武力征服，而是尊重差异，用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融合了东夷文化；他不是靠坐吃山空，而是务实创新，用“鱼盐之利”让齐国富了起来；他不是靠蛮干硬上，而是抓住机会，用征伐之权让齐国强了起来。

不管是做事业、搞文化，还是与人相处，其实都能学姜太公的智慧：尊重不同的声音，找到自己的优势，抓住关键的机会。姜太公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强者，不是征服别人，而是靠团结别人；真正的智慧，不是靠墨守成规，而是靠务实创新。

或许，这就是姜太公能被记住三千多年的原因。他不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齐国，更留下了一种能穿越时空的务实智慧。

小逢观星

这悲壮，戳人心窝

——读《大海风》

□ 逢春阶

合上赵德发先生的长篇小说《大海风》，我从书橱里找出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金蔷薇》，这是一本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，其中有一篇叫《碑铭》的随笔，碑铭是：“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”。

这悲壮的句子，戳人心窝，从40年前第一眼看到，我就一直刻印在脑海里。而赵德发先生转身向海的这部作品，也传递出一种悲壮：从背对海洋，到向海图强；一言难尽，却又意味深长。

这位以《继续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等著作深扎乡土的作家，自《经山海》开始，完成了一次“转身”。这恰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言：“不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，就算不得作家。”赵德发看到的，绝非浪漫主义的蔚蓝画布，而是命运的暗涌、生计的战场、人性的复杂，是一代代人无法挣脱又深情依恋的精神背景。他写的不仅是渔民躯体的颠簸之苦，更是他们的灵魂在时代风浪中，如渔船般承受传统与现代的“继续与决绝”。遵从内心的召唤，赵德发把对土地的眷恋投向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这也是使命的驱使。

赵德发著

大海风

作家出版社

书中人物那昭衍，不同于固守土地的封大脚，也异于仅知置地产的父亲。礼贤书院的中西灌溉，让他的人生有别于前辈。变卖祖田打造“义兴号”，是以农耕积累为抵押，叩响现代性的大门；而最终的沉船抗倭，那“毁家纾难”的决绝，又暗合了士大夫“舍生取义”的情怀。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，却又有着永不被欺凌的梦想，他是传统中国在近代化浪潮中踉跄前行的缩影。

赵德发先生将“仁义礼智信”铸成那昭衍的精神骨骼。他救助盲眼船老大、宽恕背叛的堂弟、自建灯塔惠泽乡里……在列强倾轧的乱世，其商贾身份宛若一层保护膜，内里跃动的仍是“修身齐家治平天下”的士人之心。他与张謇式的“实业救国”遥相呼应，每一步选择都超越了简单的实业功利。他引进西方技术以图自强，却无力掌控文明嫁接带来的伦理震荡。“建造—毁灭”的循环，何尝不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跋涉的隐喻？

小说物象丰盛，内涵深刻，“船”不仅是那昭衍的事业基础，更是中国在近代化浪潮中艰难前行的象征。而他筹资建造的“灯塔”，本意为航船引路，却意外指引了女儿杏花的私奔，这既象征着文明进步带来的希望，也暗喻着其带来的冲击与阵痛。这些隐喻将人物的个人经历提升到了关于民族、文明和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层面。而“血网”防腐蚀工艺、正月祭海仪式、造船的“对奔”仪式等大量经过考证的海洋民俗与生产细节，不仅让故事背景无比真实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通过人物的日常劳作和行为方式，巧妙地展现了时代的风貌和地域文化的精髓，使人物有了根脉。

《大海风》中的女性角色不只是情节的陪衬。从连名字都没有、命运悲苦的那昭衍母亲“吴氏”，到主动求婚的棧子，为爱执着的婁子、独立自主的蕙蕙，再到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杏花，她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女性群像图。这些角色以其各自的方式反抗着时代的枷锁，她们的命运轨迹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情感层次和社会内涵，使其不仅仅是男性的创业史诗，也是一曲关于女性坚韧与觉醒的赞歌。

“大海风”，这“风”既是自然之力，更是时代思潮与命运之荡。那昭衍的创业史，便是一部民族资本在全球化初潮中的挣扎史。最终，那悲壮的沉没，将“动”与“静”的矛盾推至极致：船队沉入永恒的静寂，而它所象征的民族精神，却在那一刻迸发出最夺目的光华。

如果说《继续与决绝》写的是土地的静——沉静、压抑乃至窒息的寂静，那么《大海风》写的便是海洋的动——流动、躁动、不可遏制的涌动。这“动”，正是现代性最核心的印记。赵德发先生为自己设立的目标“海立云垂、惊心动魄、汪洋恣肆、饱满圆融”，在这部作品中已然达成。

那昭衍的悲壮，不在于船沉人散的结局，而在于明知前路是惊涛与毁灭，仍选择扬帆。这种不向困难屈服，不向障碍退缩的决绝姿态，正是我们民族穿越千年惊涛的“压舱石”。合上书页，那碑铭上的文字，仿佛也镌刻下了他的名字——纪念所有死在海上、和那些即便预见死亡，依然选择驶向深蓝的灵魂。